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三个快速经济增长周期模式和成因的对比分析*

刘金全 蔡志远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经历了三个快速增长周期,即1981年至1985年的“硬扩张”周期、1992年至1996年的“软着陆”周期、2003年至2007年的“软扩张”周期。虽然这三个经济周期的持续时间基本相同,但处于我国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因此周期模式、形成原因和影响机制各不相同。这三个经济周期不仅构筑了我国增长型经济长波的主体区位,而且为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和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关键词 经济周期 经济增长 经济政策 宏观调控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一轮平均增速为9.9%的快速增长过程,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为了更为明晰地勾画出这近三分之一世纪的发展过程,我们选择其中三个快速增长经济周期作为研究对象,展示这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加速过程和主体加速区域。这三个经济周期分别是:1981年到1985年的“硬扩张”周期、1992年到1997年的“软着陆”周期、2003年到2007年的“软扩张”周期。

在1981年到1985年的“硬扩张”经济周期中,通过继续贯彻执行改革开放以来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进一步解决了一些阻碍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经矫体制改革取得了显著进展,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使得农业大幅度增产;在微观经济方面放开搞活促使了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实现了改革开放以来

平均增长率为11%的第一个快速增长时期。从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讲话所引致的经济加速到1996年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这五年构成了我国经济的“软着陆”周期。在有效控制通货膨胀的同时,经济增长速度平缓地回落到适当增长水平上。在经过1997年至2002年的经济蛰伏以后,从2003年出现的“非典疫情”到2007年世界范围开始的石油价格飙升,我国经济这五年的快速增长又构成了“软扩张”周期。在这三个时期,经济增长都在两位数的高位上运行,构成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快速经济增长过程的主体部分,它不仅为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和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长期的重要影响。

我们之所以选择和分析上述三个代表性经济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0zld006)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971055)资助。

周期,并不仅仅因为这三个经济周期都是快速经济增长周期,同时也是因为这三个经济周期的波动态势和形成原因各有不同。我们揭示这些经济周期特征的目的还在于分析和预测我国未来经济周期波动走势,为预测我国经济进入“后金融危机时期”的短期经济波动和长期经济发展提供经验证据和经济政策启示。进入2008年以后,随着世界范围内金融危机影响的蔓延,我国经济运行也进入了一个新的经济周期范围。本轮经济周期波动究竟是“先扬后抑”还是“稳中有升”,究竟是“活力W形”还是“深度U形”,都需要我们在新的经济环境下对我国经济周期的典型类型进行归纳和评析。经济周期波动也是经济运行的循环和轮回,我们经济要保持持续稳定快速增长,必然要在上述几种典型的成长性经济周期中进行选择或者叠加,因此我们对典型经济周期特征的分析就具有重要意义。

三个快速增长周期的宏观经济运行的对比分析

为了深入理解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的三个快速增长期的成因,本文对这三个快速增长周期的宏观经济运行作简单的回顾和对比分析,选取一些能代表宏观经济总体运行情况的经济指标来描述这三个快速增长周期的宏观经济运行态势。

(一)宏观经济波动模式的对比分析

本文选取从1979年第1季度到2009年第2季度的实际GDP增长率分析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情况,但是,由于我国GDP的实际增长率从1992年才开始公布,这里1979年1季度到1991年4季度的数据使用Abeyasinghe和Gulasekaran(2004)对我国实际GDP季度分解后所得出的增长率来代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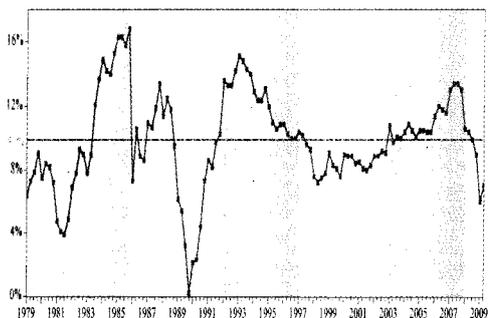


图1 GDP季度增长率图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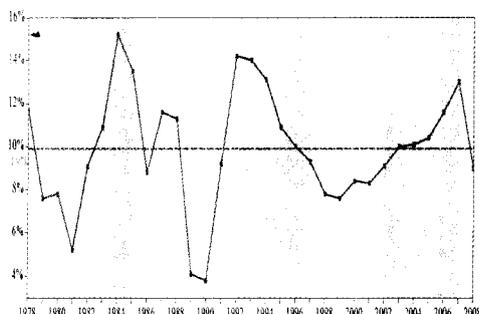


图2 GDP年度增长率图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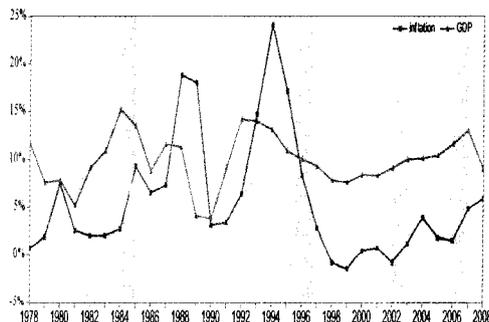


图3 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

为了对比分析,本文同时还给出了1978年到2008年我国经济年度增长率的图形(如图2)。从图中可以看出Abeyasinghe和Gulasekaran(2004)所分解出的实际GDP季度增长率的图形的走势和我国公布的年度GDP增长率的走势基本一致。1992年1季度以后的年度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的年度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经济景气月报》和《中国统计年鉴》,并经过计算整理。图中用阴影部分表示三个快速增长的经济周期的区域,它们分别是1981年至1985年的“硬扩张”周期、1992年至1996年的“软着陆”周期和2003年至2007年的“软扩张”周期,图中的实线表示各同比增长率的走势,水平虚线表示样本区间内能平均增长率,无论是季度数据还是年度数据计算出的年度平均增长率都为9.9%。

从上面的实际GDP走势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图中三个阴影区域均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三个最好时期,经济增长的平均值都在样本区间平均值以上,尤其最近两个快速增长周期都在平均值增长率之上。从图3中还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增长在“硬扩张”和“软扩张”周期中不但经济增长速度很快,通货膨胀率相对比较稳定。但是同时也可以

看到,在这两个时期中,通货膨胀在后期中都有抬头的现象出现。而经济“软着陆”周期,通过宏观调控不仅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而且还有效抑制了通货膨胀率的上升,这是非常宝贵的。

(二)三个快速增长周期中主要经济成分变化率和波动率的对比分析

根据改革开放以来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的和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我们认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三个快速增长周期,分别为1981年到1985年的“经济改革驱动阶段”、1992年到1996年的“供需双因素驱动阶段”、1997年至今为“需求单因素驱动阶段”(刘金全,2003)。根据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三个快速增长周期的经济周期波动态势,本文认为这个期间包括了最初的“经济改革驱动阶段”,也包括了从“供需”双因素驱动阶段向“总需求单因素驱动阶段”的转变过程。当经济处于“总需求单因素驱动阶段”后,经济出现了买方市场的基本形态,宏观调控也向总需求管理进行倾斜。本文通过考察一些经济总量的变化来判断这三个周期中市场形态和经济政策导向的变化。为此,我们将对经济的“硬扩张”(1981年至1985年)、“软着陆”(1992年1季度至1996年4季度)和“软扩张”(2003年1季度至2007年4季度)的周期形态进行分析。由于“硬扩张”期间没有公布季度数据,所以“硬扩张”周期阶段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均用年度数据计算得出,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和《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其中,工业生产增加值用构成GDP的工业产值代替,狭义货币M₁用的是流通中的现金M₀替代(因为M₁的数据从1990年才开始公布)。后两个快速增长周期“软着陆”周期(1992年1季度至1996年4季度)和“软扩张”周期(2003年1季度至2007年4季度)的分析均使用季度数据,数据来源为《中国经济景气月报》和《中国统计年鉴》,并经过计算整理。为了更加全面分析这三个快速增长周期的宏观经济运行情况,本文选择了总需求(社会消费增长率)、总供给(工业生产增加值)、投资(固定资产投资)、货币供给(M₁)、国外需求(进出口总额)、政府需求(财政支出)和价格水平变化(通货膨胀率)的平均增长率和波动率(用样本标准差代替),具体计算结果由表1给出。

表1 三个快速增长周期中主要经济成分的变化率和波动率对比

单位:100%

经济指标	变化率和波动率对比					
	“硬扩张”周期 (1981-1985)		“软着陆”周期 (1992-1996)		“软扩张”周期 (2003-2007)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GDP增长率	0.108	0.039	0.125	0.017	0.110	0.008
工业生产增加值(供给)	0.101	0.067	0.167	0.036	0.165	0.012
社会消费增长率(需求)	0.152	0.078	0.245	0.071	0.131	0.028
通货膨胀率	0.037	0.031	0.141	0.07	0.026	0.018
进出口总额增速	0.314	0.266	0.170	0.102	0.288	0.071
财政支出增长率	0.107	0.112	0.188	0.141	0.173	0.060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0.233	0.128	0.409	0.239	0.306	0.092
狭义货币供给 M ₁ 增长率	0.240	0.152	0.276	0.098	0.166	0.038

表1的计算结果清楚地显示出,在这三个快速增长周期中经济增长率都稳定在10%以上,说明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这三个快速增长区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体区位。从波动率看,从“硬扩张”周期到“软扩张”周期的发展过程中,这三个快速增长周期的波动率在逐渐降低,波动率从3.9个百分点一直下降到0.8个百分点,周期间波动的下降幅度都超过50%,这说明我国经济周期的波动有“微波化”的趋势(刘树成,1996;张立群,2006),同时也说明我国宏观调控能力的增强,宏观经济调控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和良好的成绩。

通过经济周期特征的对比可以发现,在所考虑的三个经济周期中,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发生了显著变化。代表供给水平的工业生产增加值从经济“硬扩张”周期的10.1%上升到“软着陆”周期和“软扩张”周期的16%以上,说明我国总供给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而社会消费增长从经济“硬扩张”周期的15.2%上升到“软着陆”周期的24.5%,说明我国消费需求的增长非常旺盛;在“软扩张”周期,消费需求有所下降,说明我国现阶段仍要继续实施扩大内需的政策。从供给和需求的波动情况来看,我国宏观经济波动情况同样也出现了稳定化的趋势。

三个经济周期中反差最大的指标是通货膨胀率。在“硬扩张”周期平均通胀率仅为3.7%,波动率为3.1%,这说明我国经济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为了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平均值就比较低。“软着陆”周期平均通胀率为14.1%,同时波动率为7.0%,说明此间的通货膨胀率水平值高且波动性大,这是1992年经济过热,通货率剧增留下的后果。“软扩张”周期,通胀率又下降到2.6%,

且波动率也降到 1.8%，价格水平变化又回落到较低的水平。但是从 2007 年底开始的价格上升的惯性和外部价格冲击导致了 2008 年我国通货膨胀加剧(2008 年前两个季度的通货膨胀平均值达到了 7.9%，是“软扩张”期间平均增长率的三倍还多)，对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三个快速增长周期中经济政策工具规模的对比分析

宏观经济调控是国家干预经济的主要手段，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促使就业水平的提高、减轻经济波动、防止通货膨胀和实现稳定经济增长。宏观经济调控的工具主要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两大类，它们都是通过影响利率、消费和投资进而影响总需求来实现对宏观经济的调整(Blanchard and Fischer, 1989; Romer, 2001)。为了更加清楚地了解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投资和国外需求在“硬扩张”周期、“软着陆”周期和“软扩张”周期的作用，本文利用这些宏观经济指标占同期名义 GDP 的比例和相应的波动率来度量经济规模和政策规模以及它们的变化幅度，这里使用 1978 年到 2008 年的数据，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和《新中国 55 年统计资料汇编》。具体计算结果由表 2 给出。

表 2 三个经济周期内经济政策工具规模的对比

单位:100%

经济 指标	“硬扩张”周期		“软着陆”周期		“软扩张”周期	
	占 GDP 比例	标准差	占 GDP 比例	标准差	占 GDP 比例	标准差
财政支出	0.232	0.006	0.123	0.012	0.187	0.008
进出口总额	0.167	0.036	0.361	0.042	0.618	0.062
固定资产投资	0.241	0.031	0.355	0.027	0.481	0.057
流通中的货币 M ₀	0.094	0.014	0.146	0.019	0.132	0.009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0.477	0.005	0.397	0.010	0.369	0.012

从表 2 中首先可以看出投资波动对经济周期存在显著影响。在这三个快速增长期间，固定资产稳步上升，在“硬扩张”期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同期 GDP 的比为 24.1%，且波动率为 3.1%，这个期间是我国经济进入改革开放的比较好的一段时期，投资增长是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当经济进入“软着陆”周期后，投资规模上升到同期产出的 35.5%，且波动率下降到 2.7%，这个期间由于紧缩性政策导致经济出现稳定化，经济实现“软着陆”，投资稳定是经济稳定的主要原因。

当经济进入“软扩张”周期后，投资比率上升到 48.1%，正是这种具有积极财政色彩的投资扩张，导致了我国经济“软扩张”的形成。这个期间财政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拉动作用，说明我国财政政策机制中具有“Wagner 效应”(即公共支出与国民收入之间的正相关性, Biswal, Dhawan and Lee, 1999)，这也是经济增长效率、经济政策规则和资源配置优化程度提高的体现。

从表 2 中数据可以看出，“软着陆”周期流通中的狭义货币规模仅为同期产出的 1.55 倍，但波动标准差为同期产出的 0.248 倍，这表明中央银行在利用控制货币供给和需求存量，而不是利用名义利率来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如此货币政策工具的选取可以在短期内有效遏止通货膨胀；“软扩张”周期的货币政策则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扩张性，但政策工具却由货币总量控制转变为名义利率调整和公开市场操作，利用多次名义利率的微调来进行信贷需求管理和增强资金流动(Valente, 2003)。由此可见，“软着陆”周期的货币紧缩用于遏制通货膨胀，“软扩张”周期的货币松动用于刺激总需求，我国的货币政策操作具有明显的短期效应。因此当 2008 年出现通货膨胀压力时，宏观调控再一次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其主要目的仍然是针对通货膨胀进行目标管理，但是有的学者也强调引入供给管理的必要性(刘伟、苏剑，2007)。

同时还可以发现，国外需求在“硬扩张”、“软着陆”和“软扩张”周期都有显著的变化，国外需求在这三个周期中呈现递增的趋势，而且两个周期之间的涨幅超过了一倍。国外需求占我国 GDP 的比例和波动性都出现上升的趋势，意味着国外需求开始对我国经济周期波动产生重要的影响。尤其是进入 2008 年后，随着国际石油价格剧烈动荡、世界范围内粮食大幅涨价、美国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影响的蔓延，国际经济环境出现了重要变化。

三个快速增长周期形成原因的对比分析

从上述三个快速增长周期的基本态势的分析中可以发现，虽然这三个快速增长的经济周期的形态有比较大的差距，但是它们都实现了快速经济增长，都与我国经济政策和宏观调控密切相关，

下面我们继续对经济的三个快速增长周期的形成原因进行对比分析。

(一)我国“硬扩张”周期的特征和形成原因

我国“硬扩张”周期恰好是我国经济建设的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实现的第一轮快速增长周期,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时期,微观经济的放开搞活取得了一些成绩(“六五”经验研究组,1986)。“硬扩张”期间,我国政府吸取了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经济发展中急于求成和冒进的教训,继续贯彻执行1979年4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促进了财政和经济状况的好转。在这个期间里,重要产品的产量有大幅度地增长,尤其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业生产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从下图农业GDP增长率的图形可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GDP的平均增长率仅为4.6%,而在“硬扩张”时期的农业GDP增长率竟高达8.3%,接近平均增长率的2倍,与此同时,其他商品的增长率也有了大幅度提高,除粮、油外都已经基本取消票证,敞开供应,基本解决了人们的吃穿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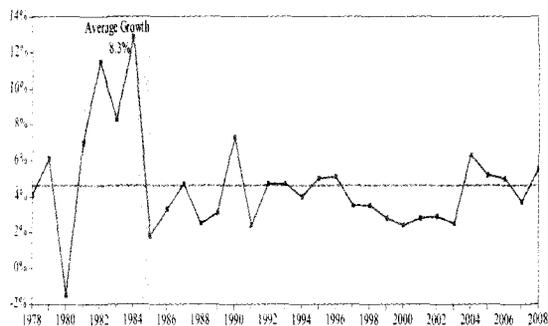


图4 农业GDP增长率

但是,“六五”期间国民经济发展中也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特别是“六五”后期,在经济形势好转的情况下,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消费基金增长过猛,货币发行过多,对经济稳定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加上在前一个五年计划出现问题的情况下,我国经济快速增长表现出的“后劲”不足,也说明这轮经济快速增长相对于2003到2007年的“软扩张”来说是一次有点勉强的“硬扩张”,这对我国经济后期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不良影响。从图2中可以看出,从1984年底开始,我

国GDP增长率有所下降,而通货膨胀率有所抬头,这也说明这个期间的宏观调控还缺乏经验,存有失误之处。

总之,在“硬扩张”时期,我国经济实现了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快速增长时期,经济的改革是“硬扩张”时期经济快速增长的决定因素。这个期间不但实现了我国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解决了生产和生活的供给问题,改善了人民生活,使国家财政逐年好转,而且打开了对外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流的新局面。我国开始全面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步入“黄金”时期。

(二)我国“软着陆”周期的特征和形成原因

我国经济的“软着陆”周期的出现源于1992年的经济过热。当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4.2%,通货膨胀率也从1991年的3.4%上升到6.4%。1993年通货膨胀率再上升到14.7%,1994年达到24.7%的顶峰。经济过热的突出表现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投资结构不合理,199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2.6%,1993年达到50.6%。面对这种严峻的经济局面,我国在1993年开始加强宏观经济调控,采取了抑制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的紧缩性政策,在1996年年底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经济过热的现象得到了抑制和消除,严重的通货膨胀得到了抑制,财政和人民生活方面都得到了改善,更难能可贵的是平均经济增长率仍然在两位数以上(李京文,1998年)。虽然,经过紧缩性调整,我国短期经济周期波动出现了显著放缓的趋势,但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波动态势依然存在。经济“软着陆”是“旧经济干预”(卖方市场和供给管理政策)阶段的结束,也是“新经济干预”(买方市场和需求管理政策)阶段的开始。经济“软着陆”向经济“软扩张”的转换,不仅是短期经济周期波动模式的转换,也是我国经济运行的阶段性转换。根据经济总量的构成和规模,可以将我国经济增长阶段划分为“总供给单因素驱动阶段”(1978年至1993年)、“总供给和总需求双因素驱动阶段”(1992年至1996年)和“总需求单因素驱动阶段”(1997年至今)(刘金全,2003)。在“总供给和总需求双因素驱动阶段”,由于供给和需求管理政策双重有效,经济实现了比较快速的增长,但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非均衡落差,导致

了一定程度的市场失调,既出现了总需求过剩情形下的通货膨胀,也出现了总需求不足条件下的通货紧缩,与之相应的波动性和周期性也比较明显;在“软着陆”过程中,由于驱动力量主要来自社会总需求,总需求不足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减缓,因此需要实施需求管理政策来刺激总需求的形成,此时经济政策的目标和规则均比较明确,进而导致经济波动减弱和经济周期模糊(刘金全、刘志刚,2005年);与此对应,“软扩张”的出现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中又出现了以总需求驱动为主、总供给驱动为辅的新迹象。此时,较高质量和较高效率的经济产出行为将对“培育”社会总需求产生重要影响,而供给管理政策与需求管理政策的搭配组合也使得经济政策的作用机制得到进一步加强(Barro and Sala-i-Martin, 1995)。

我国经济在1996年开始实现“软着陆”是一次比较成功的宏观调控,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逐步平稳地回到适度区间,物价上涨逐步回到适度水平,实现了在较低通货膨胀水平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快速增长。但是,在1997年经济实现“软着陆”以后,国家对宏观经济仍保持紧缩性政策,经济增长连年出现了下降,加之亚洲经济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率在1998年达到最低点的7.3%。1998年以后我国实行了连年的扩张性“积极财政政策”,使得我国经济在随后的年份均保持在“自然率”水平附近,社会经济得到平稳快速发展,但是通货膨胀处于较低水平,通货膨胀率甚至降低到零水平以下,出现了轻微的通货紧缩,因此这段时间扩大内需成为主要任务之一。导致我国经济从“软着陆”进入“蛰伏”周期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场形态和经济增长阶段的改变(刘树成,2004),我国经济增长阶段从“软着陆”转向“蛰伏”期伴随着经济驱动因素从“供需双因素驱动”向“总需求单因素驱动”阶段的变化。由于经济政策以偏紧为主,所以我国经济在实现“软着陆”以后,呈现出一定的惯性,以至于有人担心经济衰退的来临。但是我国经济在“蛰伏”期进行调整以后,经济的稳定性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从图1中可以看出我国宏观经济的主要变量在“U”型谷底进行多年的调整以后,在逐步稳定中逐渐上升,为下一阶段经济“软扩张”孕育了良好的势头。经济增长稳定性的提高意味着我国经济开始接近经济增长的

“自然率”水平。通过选取财政支出增长率、M1供给增长率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等序列来代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投资政策的工具,建立这些时间序列与经济增长率序列之间的协整关系,来判断经济政策工具在“自然”状态下对应的“自然率”水平,可以得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自然增长率”水平为8.6%(Barro and Gordon, 1983;刘金全、佟新华,2005年)。可见,我国经济“蛰伏”周期正是在“自然增长率”水平附近徘徊和盘整,积蓄了加速的能量。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间,我国经济的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9.9%,这个平均水平仍然高于本文的“自然增长率”的估计值。这种对比结果具有两个重要启示,一个是从经济长波形成和持续的角度来看,我国建国以来的第一个增长型经济长波已经形成,并且该经济长波的主体区位已经显现出来,甚至很可能目前正处于该轮经济长波的中心位置,随后的快速稳定增长将延续到其后的二十年,进而形成一个人类历史上跨度最大的增长奇迹;另一个是从经济长波的波动形态上来预期未来经济增长轨迹的基本特征看,由于经济长波必然围绕着“自然增长率”展开,因此我国的经济长波波形将出现整体水平的拖尾性的下滑,我国下一个经济周期的均值过程就很可能围绕在8%左右的增长率水平附近小幅徘徊。因此,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时,应该对我国经济增速的小幅回落给出预判并做出相应的调控准备。

(三)我国经济“软扩张”周期的特征和形成原因

我国经济发展经过了“硬扩张”周期和“软着陆”周期的转换,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经济环境都发生了显著变化,经过一段“蛰伏”期的调整,经济开始出现缓慢的扩张。从1998年开始,我国采取了具有积极色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来刺激总需求的形成,尤其是从2003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始,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了新态势,不仅出现了一轮具有“软扩张”性质的周期波动(刘金全,2003年),而且经济增长的长波特征得到了进一步巩固。此轮“软扩张”周期不仅促使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开始缓慢回升,而且又一次凸现了我国增长型经济周期的基本轮廓,也降低了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程度(刘树成,

2003年)。正是这轮经济周期在平稳中展开,同时人们在受到“非典疫情”影响时对经济加速预期和准备不足,导致本轮经济周期波动具有“软扩张”的色彩。

针对2003年我国经济增长的突然加速和随之出现的通货膨胀加剧,中央及时地采取了宏观调控措施,以期遏止经济出现“过热”。不过,紧缩性调控虽然起到了优化产业结构和改善资源配置的效果,但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回升却没有产生显著的阻碍。我国经济出现了“适度高位平滑化”,这说明我国经济在波动的位势上可能实现持续多年的适度高位运行,并在波动幅度上可能进一步平滑化,这说明我国经济波动趋缓,经济稳定性增强(刘树成等,2005年)。进入2008年以后,我国经济发展不仅有国内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同时也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重大冲击,促使我国对经济开始相应的积极调控和干预,导致我国本轮经济扩张更具有“软性”的成分,但是绵长的增长动力已经成为后来抵御金融危机的重要基础。

经济“软扩张”过程与经济“软着陆”过程一样,既是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体制和市场体制逐渐发展和完善的结果,也是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阶段。本轮“软扩张”经济周期为以后的经济持续增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形成了我国第一个具有高位平稳性质的增长型经济周期。

三个快速增长周期波动模式 和形成原因的影响和启示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三个快速增长周期的走势图可以看出从经济“硬扩张”到“软着陆”再到“软扩张”,我国经济发展都基本处于样本区间的平均增长率以上运行,三个阶段的经济平均增长率都超过了10%以上。从上面分析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三个快速增长的经济周期的波动模式和形成原因中,我们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

首先,从图中这三个快速增长的经济周期看,不仅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在逐年上升,而且经济的波动在逐年下降,这说明我国经济增长率已经开始向高位稳定方向发展,经济波动的幅度将进一步稳定,经济增长率开始向经济增长的“自然率”回归,经济波动的模式也将在“软着陆”到“软扩张”中轮回,其中的调整时期将会随着宏观调控

的增强而逐渐淡化,甚至消失。从图3中可以看出这三个快速增长周期的持续时间都为5年,而两个周期之间的调整时间为8年左右,如果按照这个规律推算,我国经济将会从2008年开始出现以“软收缩”为基调的长时期的调整阶段。但是本文认为这个阶段的调整与前两个调整时期不同的是,随着宏观调控的不断增强,在经济波动趋缓的大趋势下,我国经济在接下来的调整幅度、范围将会减弱,在时间上将会缩短。与此推断巧合的是,我国经济的“软收缩”的产生则是由于世界金融危机影响所导致的,但经济“软扩张”留下的调整余地和政策操作空间为抵御金融危机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也是我国在2009年能够实现8.7%增长速度的重要原因。

其次,我们注意到,在“软扩张”周期中,虽然实际产出仍然保持了高位上的惯性增长,但以信贷规模和资本市场规模为代表的名义经济规模已经出现了显著收缩,股票市场各种股指已经“硬收缩”到七年前的水平。虽然股票市场急剧下跌减缓了流动性过剩压力和阻击了各种热钱的金融攻击,但是却为总供给管理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形成了CPI下降而PPI上升的“翘翘板”现象。因此,我国在抵御金融危机时,能够采取大规模的投资措施,并采取新一轮实际经济形态和名义经济形态双重扩张的宏观管理策略,这不仅有效地保证了2009年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同时实现了股票市场的快速复苏,还大大地降低了通货膨胀率和通货膨胀预期,为2010年经济结构调整和提高经济增长效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调整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的期限结构和适时“淡出”赢得了宝贵时机。由此可见,上一轮“软扩张”经济周期同“软着陆”经济周期一样,都是有效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结果,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功能得到进一步发挥的体现。

再次,在“软扩张”经济周期中,我国区域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软扩张”出现了不同步和不协调的现象,区域经济增长差距仍然明显,产业结构调整亟待加强。随着“软扩张”周期结束和“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到来,我国政府仍然需要继续关注我国区域经济的平衡和协调发展问题,宏观调控应在保持整体经济发展的同时,积极管理并保持区域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平衡发展,对国家经济风险管

理给予充分重视,这些都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物质保障。区域经济之间经济增长水平的趋同不仅有助于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而且还能够提高国家资源的配置效率,为整体经济增长提供新的活力,进而成为全面防范外部冲击和突发事件影响的保障。但是,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将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因此在宏观经济政策操作中,应该注重各种投入的平滑性和持续性,绝对不能产生短期内的“追赶冲动”或者“盲目放弃”,以免出现因政策显著更改而导致的调整成本。因此,在2010年的经济操作和制定“十二五规划”时,应该充分考虑到调整经济结构的需要,适度保持经济政策的规则性和稳定性,从而降低各种预期不确定性带来的负面影响。

总之,通过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三个代表性的快速增长周期的短期波动模式进行的成因和对比分析发现,我国经济在2008年开始新一轮经济周期的调整,2010年进入了这轮经济周期的中间阶段。我国的新一轮经济周期仍然会保持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格局和长波态势,可能出现微波化的“W型”周期轮廓,经济运行仍然会在稳健性宏观调控下保持适速、持续和稳定增长,我国建国以来第一轮增长型长波的主体位置将围绕着“自然增长率”水平延伸下去,未来经济周期的模式将会在这三种具有稳定性的周期模式中进行轮回、选择和叠加。随着我国经济规模提高、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和产业结构效益提升,在增强通货膨胀预期和经济政策预期等信息管理的同时,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将在基本稳定的前提下适度减缓,但所有变化都将继续保持“软化”变动的调整特征。^①

参考文献

1. “六五”经验研究组:《对“六五”时期建设和改革问题的回顾与思考》,《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
2. 李京文:《论国家宏观调控》,载王洛林主编《中国经济周期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
3. 刘金全:《从“软着陆”到“软扩张”》,《经济学动态》2003年第5期。

4. 刘金全、佟新华:《我国经济增长的“自然率”水平与可持续增长路径的识别与检验》,《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10期。
5. 刘金全、刘志刚:《我国经济周期波动中实际产出波动性的动态模式与成因分析》,《经济研究》2005年第3期。
6. 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经济研究》1996年第11期。
7. 刘树成:《中国经济波动的新轨迹》,《经济研究》2003年第3期。
8. 刘树成:《新一轮经济周期的背景特点》,《经济研究》2004年第3期。
9. 刘树成、张晓晶、张平:《实现经济周期波动在适度高位的平滑化》,《经济研究》2005年第11期。
10. 刘伟、苏剑:《供给管理与我国现阶段的宏观调控》,《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11. 张立群:《中国经济周期微波化趋势探讨》,载刘树成主编《中国经济周期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12. Abeyasinghe, T. and Gulasekaran, R., “Quarterly real GDP estimates for China and ASEAN4 with a forecast evaluation”, *Journal of Forecasting*, 2004, 23, 431 - 447.
13. Barro, R. J. and D. B. Gordon, “A Positive Theory of Monetary Policy in a Natural - rate Mode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3, 91, 4, 589 - 610.
14. Barro R. J. and X. Sala - I - Martin, *Economic Growth*, MA: McGraw - Hill, Inc, 1995.
15. Biswal, B., Dhawan, U. and H. Y. Lee, “Testing Wagner Versu Keynes Using Disaggregated Public Expenditure Data for Canada”, *Applied Economics*, 1999, 31, 1283 - 1291.
16. Blanchard, O. J. and S. Fischer, *Lectures on Macroeconomic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9.
17. Ginsburgh, V. and P. Michel, “Optimal Policy Business Cycles”, *Journal of Dynamics & Control*, 1998, 22, 503 - 518.
18. Valente, G., “Monetary Policy Rules and Regime Shifts”, *Applied Financial Economics*, 2003, 13, 525 - 535.
19. Romer, David, *Advanced Macroeconomics*. 2nd ed. Boston, MA: McGraw Hill, Inc, 2001.

作者简介:刘金全,经济学博士,吉林大学商学院院长,数量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蔡志远,吉林大学数量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长春,130012

(责任编辑:曹小春)